

侍產假風波與世代差別

郭樺
黃子為
鄭宏泰

政府最近建議將法定侍產假日數由3日增至5日。在家庭友善政策落後於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下，香港「追落後」的建議卻引發社會不少反響。其中一如所料的，有代表僱主和商界利益的人士及商界領袖等，提出理據和親身經歷作出質疑，反對增加侍產假的建議。他們的說話是否合理，明眼人自有判斷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這些商界代表和領袖不約而同講到自己一輩在太太生小孩時，從未享受過侍產假，甚至太太分娩時都沒從旁照料，可當年社會的出生率卻遠比今天高。言下之意，今天社會將生育率低的問題歸咎於社會福利不足上，並要商界「埋單」，既有邏輯錯誤，亦於理不合。這些說話在今天這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，很自然地引發社會批評。這些商界代表自然難逃被標籤為「孤寒」財主，有人更認為那是「有錢人講風涼說話」。

從宜業社會轉向宜居社會

最近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（亞太所）公布一項關於法定侍產假的民意調查顯示，近九成受訪市民支持政府將法定侍產假由3日增至5日的建議，而且超過一半人認為侍產假增至5日並不足夠。增加侍產假的建議有如此高支持率，當然說明該建議有高度社會共識，並從某個角度上揭示對待侍產假的態度，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未必有很大關係。反而值得留意的是，香港各個世代對侍產假的看法到底有何區別？是否年長一輩因為個人經歷不同，對社會福利有較深懷疑？

侍產假是社會福利的一種，相比同等先進的社會，香港遠算不上福利社會。從社會進步角度看，香港是時候考慮如何從「宜業社會」向「宜居社會」轉變。隨着人口急劇老化和出生率持續萎縮，改善社會福利政策——尤其鼓勵生育——不僅可以從根源上應對社會問題，更可增加社會動力。了解不同世代對社會福利的看法，是制訂福利政策的基礎，侍產假風波恰好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窗口。

對香港世代問題的討論，最為人熟知的是呂大樂。他的「4代香港人」概念，雖非學術界嚴格意義上的「cohort」，而只從不同年齡層的市民的成長經歷分野入手，卻引起社會廣泛討論。我們不妨沿着這個視野，窺探不同年齡層——即簡單意義上的「世代」——在侍產假問題中所反映的問題。

呂大樂對香港4代人的簡單劃分是：「第一代」為1945年或以前出生者（現73歲及以上）；「第二代」出生於1946至1965年間（現53至72歲）；「第三代」出生於1966至1975年間（現43至52歲）；「第四代」出生於1976至1990年間（現28至42歲）。

「第一代」生於二戰前，經歷過生活困苦，現已進入耄耋之年。「第二代」又稱「嬰兒潮一代」，很多人在香港經濟起飛過程中成為各行各業的成功者和領導者。「第三代」、「第四代」港人相對「第二代」面臨更激烈的社會競爭，社會上流空間相對較窄。反對和質疑增加侍產假的商界代表和領袖，應是「第二代」港人，但他們的看法又是否能夠代表其所屬的整個世代呢？

我們將受訪市民按年齡劃分其所屬世代，並將1990年以後出生的受訪者界定為「第五



郭樺、黃子為、鄭宏泰：從深入分析的資料看，5個世代的大多數受訪者對增加侍產假的建議都表示支持。這說明對侍產假的態度，並非支持與否的分歧，而是支持程度強烈的差別。（資料圖片）

表1：5代香港人對增加法定侍產假建議的態度

	第一代	第二代	第三代	第四代	第五代
支持	80.6%	85.0%	88.3%	94.0%	97.3%
不支持	9.0%	8.9%	5.2%	4.2%	2.7%
不知道／很難說	10.4%	6.1%	6.5%	1.8%	0.0%
人數	67	247	155	168	73

表2：5代香港人對5日侍產假長度的態度

	第一代	第二代	第三代	第四代	第五代
足夠	34.3%	42.5%	27.1%	21.4%	28.7%
不足夠	41.8%	46.2%	60.0%	64.3%	60.3%
不知道／很難說	23.9%	11.3%	12.9%	14.3%	11.0%
人數	67	247	155	168	73

註：經「卡方檢驗」，世代與態度有顯著關係 ($p < 0.05$)

代」，這個世代包括「90後」至部分千禧年代出生的青年。即是說，我們將受訪者分為5個世代，按照各世代對增加侍產假建議的態度計算百分比。

各世代基本支持增侍產假

從深入分析的資料看，5個世代的大多數受訪者對增加侍產假的建議都表示支持（表1）。世代愈後者，愈支持增加侍產假的建議。這說明對侍產假的態度，並非支持與否的分歧，而是支持程度強烈的差別。從「第一代」八成人支持到「第五代」近乎全數支持，可見各個世代對增加侍產假基本上支持，但程度上則有差別。

如果在支持增加侍產假建議上世代分歧不大，那麼對將侍產假增至5日是否足夠的態度，則更能展現世代之間的差別（表2）。整體來看，各個世代的多數都認為將侍產假增至5日「不足夠」。但是，「第一代」和「第二代」認為5日侍產假「不足夠」的比率顯著低於其他世代，其中尤以「第二代」認為「足夠」和「不足夠」的比例最為接近。換句話說，「第二代」對於增加侍產假日數是否足夠的問題，有最大分歧。

多數人已能走出自己世代局限

透過世代分析的結果說明，某些商界代表和領袖對於侍產假的表態，可能是其所屬世代的特有看法。「第二代」港人經歷了香港歷史上

最成功的時代，很多人的成功故事都是以個人努力和奮鬥開始，個人經歷讓這世代的港人篤信資本主義的自由信條，對福利主義比較抗拒，情況不難理解。所以他們認為社會不平等和其他諸多社會問題更應歸結為個人原因，而不能以社會為藉口，特別不能以商界為箭靶，全部由他們「埋單」。

一個人要跳出個人所處的世代來看問題，着實不容易。但事實同樣證明，多數人已經能夠走出自己世代的局限，去接受社會進步的要求。



對今天年輕人而言，第一、第二世代長輩觀念保守並不可怕，需要警惕的卻是當自己老了的時候，也會站到保守的位置上抗衡社會變革。這實在更是我們思考當前社會可如何走向更「宜居」問題的核心所在。

作者郭樺、黃子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，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